

柳宗元詩文選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
贈閱

河東

柳宗元

集卷第三

論

封建論

頂天書院
堂審稽印

晉文公
評注善本

而
古
本

卷三

三

三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
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
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重校無
二之字彼封
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陝西人武成而蕞狹去之
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一有
賦字其

生人之初乎

一無
生字

不初無以

非

I214.2 / 2

柳宗元诗文选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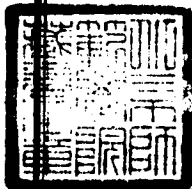
《柳宗元诗文选注》编辑组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18655

陕西人民出版社



618655

柳宗元诗文选注

《柳宗元诗文选注》编辑组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300

书号：11094·17 定价：0.72元

前 言

柳宗元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法家政治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著名的文学家。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公元七七三年出生于长安一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仕宦家庭。二十一岁考取进士，二十六岁中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正字，以后又担任过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等职。公元八〇五年春，参与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政治革新，改任礼部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十年后远贬为柳州刺史。公元八一九年病死于任所，年仅四十七岁。柳宗元的一生，是追求革新进步的一生。政治革新失败以后，他虽然一再遭到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打击，却并没有屈服，而是以锋利的战笔，继续同保守派作斗争，捍卫和坚持自己的法家立场和政治主张。他在十四年的贬滴生活中，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和人民，写下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诗文。柳宗元去世以后，其著作由他的挚友刘禹锡整理编辑成《柳河东集》，流传于世。这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份珍贵的财富。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研究柳宗

元的法家思想，总结这一时期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这对于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复辟倒退的孔孟之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要意义。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柳宗元的诗文和他的法家思想，正是唐代中期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是当时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的产物。

隋末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特别是狠狠打击了最反动的世家豪族地主势力，使土地高度集中于豪族地主手中的状况有所改变，一部分奴婢荫户摆脱了对豪族地主的依附关系，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面对着这种社会现实，唐初的统治者，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顺应历史潮流，实行均田制，推行限制大地主、扶植中下层地主的法家路线。于是，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唐王朝初期经济繁荣的局面。

实际上，这种表面繁荣的底下仍然存在着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剥削。地主阶级通过土地兼并，不断地鲸吞和蚕食自耕农，破坏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在剥削农民方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部曲佃

客荫户制，就是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被称作“佃客”的农民，作为“荫附者”，被牢固地束缚在大地主的土地上，失去了人身自由，实际上已经沦为农奴。这是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最反动的环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另一种是客户佃耕制，就是中下层地主占有土地，农民作为“客户”，实行佃耕，按照契约给地主缴纳地租。在佃耕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轻，同部曲佃客荫户制下的“奴客”相比，还有着一定的生产积极性。

唐代以玄宗李隆基的尊孔崇儒为标志，开始了由盛转衰的过渡。由于大地主阶级经济的发展，统治集团中的儒家路线逐渐占了上风，从开元末年开始，直到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完全抛弃了李世民和武则天的法家路线，推行代表腐朽的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路线。在这条反动路线支配下，大地主阶级经济随着分封和兼并而急速地发展起来。据史书记载，唐初食封者仅二十几家，到了中宗景龙年间，已经增加到一百四十余家，及至中唐，其数益众。这些贵族大地主，还有一批新生的官僚大地主，加上隋末遗留的世家豪族，形成一个庞大的大地主集团。他们凭借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残酷剥削农民，恣意兼并土地，迫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逃亡流徙，以至不得不“依富为奴客”（《新唐书·食货志》）。这样，不仅自耕农经济急剧破产，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激化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而且中

下层地主也受到压抑和打击，加深了中下层地主同大地主之间在负担赋税以及争夺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的矛盾。

随着大地主阶级经济的发展，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局面日益严重。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宦官、藩镇势力恶性膨胀起来。唐京都长安附近的土地，多为宦官和他们所控制的神策军所占有。各地藩镇更是“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实际上是些独霸一方的大地主集团。藩镇割据势力的武装核心“牙将”，又“多豪姓子”（《旧唐书·杜亚传》）。可见，大地主是宦官和藩镇的阶级基础，而宦官和藩镇则是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左右朝政。宦官“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蠹害朝政。”（《通鉴·昭宗纪》）甚至宦官的喜怒，可以决定大臣的安危和皇帝的废立。藩镇依仗其经济和军事力量，飞扬跋扈，无视中央，“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旧唐书·李怀仙传》），甚至父死子立，强迫朝廷加委，侵夺州县，公开举行叛乱，严重地威胁着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破坏着国家的统一。

藩镇的割据和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时而联合反唐，时而相互火并，战祸接连不息，对其统治区的人民，巧取豪夺，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使人民蒙受极大的痛苦和灾难。这些藩镇又“以赋税自私，不献于朝廷”

（《新唐书》卷一三五），致使唐王朝“经费不足，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通典》卷七），沉重的赋税自然就落在广大农民的身上。例如德宗在位的二十六年间，农民的实交赋税便翻了两番。农民不胜其苦，大量破产逃亡，北方地区，农村凋敝，千里萧条，江淮一带，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公元七六二年，浙东爆发了以袁晁为领袖的农民起义，“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旧唐书·李光弼传》），人数达二十多万，所向披靡，连续攻下浙东十几个州县。公元七六四年，陕南秦岭一带爆发了以高玉为首的农民起义，革命烽火，数月不息，直接威胁着唐王朝的京城长安。柳宗元出生后的第九年，江西省波阳湖一带也发生了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广东、安徽、湖南、四川、贵州、河南等地的农民起义也相继出现。这些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冲击着腐朽的封建统治，为唐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推翻李唐王朝，准备着条件。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基本矛盾的激化，必然加剧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和派别之间的矛盾，促使他们的分化，推动儒法斗争。大地主阶级为了保持自己既得的政治经济特权，极力维护腐朽的反动统治和分裂割据的局面，排挤、打击中下层地主阶级。而中下层地主阶级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迫切要求进行政治革

新，期望通过打击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以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挽救社会危机，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在这种情况下，经过长期的组织、酝酿，终于在支持革新的顺宗李诵登上帝位之后，出现了公元八〇五年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政治革新。柳宗元积极地参与了这场政治革新，并成为其中坚。

革新派上台后，积极推行法家路线，采取了一系列扫除弊政的措施。他们贬斥保守派，起用进步势力，免除一些杂税，放还部分宫女，取缔了“宫市”，夺取了落在保守派手里的盐铁税管理权，并且极力要从宦官、藩镇手中夺取兵权，把打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以藩镇和宦官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这些改革反映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客观上也符合广大人民渴望统一安定，发展生产的要求，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是，由于这时候整个地主阶级愈来愈走向反动，这次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政治革新，不可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因而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便在反动保守势力的反扑下失败了。

保守派重新上台后，对革新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们杀害了王叔文，逼死了王伾，贬黜柳宗元等八人为边远地区的州司马，并且下令“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这场政治革新虽然失败了，但是革新前进同复古倒退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止息。保守派的思想代表韩愈，狂热鼓吹孔孟之道，妄图从政治思

想上消除革新势力的影响。革新派的思想代表柳宗元，则奋起反击，勇敢捍卫法家的革新路线。儒法两家的斗争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更激烈地展开了。

维护国家统一，还是搞分裂割据，这是封建社会中儒法两家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唐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以藩镇、宦官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势力的恶性发展，使唐王朝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于是，主张恢复分封制，反对实行郡县制的论调又泛滥起来。韩愈就狂热地鼓吹世袭的分封制，咒骂秦始皇行郡县是绝灭“先王之法”，“无分势于诸侯”，所以“传二世而天下倾”（《杂说四首》），妄图通过对历史的歪曲，论证藩镇割据的“合理”，为大地主阶级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制造反动舆论。

柳宗元作为中下层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思想代表，坚决反对分封制，主张郡县制，坚决反对分裂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他在著名的《封建论》中，以“势”的观点，说明了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客观形势造成的，并不以“圣人”的意志为转移。他热情赞扬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全中国的伟大功绩。他指出秦朝所以二世而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他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实行分封制只会造成诸侯强横、国家分裂的局面，而实行郡县制则便于加强中央集权，有

利于国家统一。他总结了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的经验教训，肯定唐王朝“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认为只要“善制兵，谨择守”，就能够铲除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柳宗元的《封建论》，从理论上对秦朝以来关于封建与郡县问题的论争作了历史的总结，有力地批判了当时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思潮，对于分裂割据的藩镇势力，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搞世卿世禄，还是任人尚贤，这是唐代中期与分封制同郡县制的论争紧密相联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崇尚门第，排斥异己，几乎把持了唐王朝的各级政权；各地藩镇，更是父以传子，独霸一方。他们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拚命鼓吹儒家的“亲亲”路线。韩愈大肆叫嚷“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禹问对》），妄图为大地主阶级的政治垄断作辩护。

为了打破大地主阶级的垄断统治，使中下层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进行革新，柳宗元提出了一条“任人唯贤”的路线。他主张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封建论》），就是要任用坚持统一、革新的“贤者”——法家人物，来取代“不肖者”——搞分裂倒退的顽固分子。他征引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痛斥了儒家把“贱妨贵、远间亲、新闻旧”说成是大逆不道的传统谬论，针锋相对地指出，“贵不足尚”、“亲不足与”、“旧不足恃”（《六逆论》）。这是对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维持其世袭特权的“任人

唯亲”路线的大胆挑战，也是对韩愈攻击革新派“超资越序”、排斥“元老故臣”谬论的有力回击。

韩愈为了替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效劳，凶相毕露地叫嚣统治者的天职就是压迫剥削人民，人民的本分就是供养侍奉统治者，如果不尽本分就该杀头。与此相反，柳宗元从中下层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出发，认为统治者的一切政治措施应该“顺人顺道”（《断刑论》），顺应社会的发展，顺应人民的愿望；王朝的官吏只是“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如果不尽职，就该“黜罚之”（《送薛存义序》）。当然，柳宗元所说的“民”，主要是指中下层地主阶级，但是这种主张，却正是对韩愈杀气腾腾的“诛民”说的否定与批判，表现了柳宗元对大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极大不满，以及要求政治革新的强烈愿望。

马克思指出：“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中唐时期，“反天命”与“尊天命”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一场政治斗争，是中下层地主阶级革新派坚持统一、前进同大地主阶级保守派主张分裂、倒退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在哲学领域里的反映。柳宗元继承了前辈法家人物的战斗传统，以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同韩愈之流鼓吹的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儒家道统自居的韩愈，为了维护大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极力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不仅宣扬天有意志、主宰一切的宗教神学，甚至疯狂鼓吹

仇视人类生存发展的极端反动的刽子手哲学，竟然胡说残害人民的人有功于天，能得到天赏，而改造自然的人有祸于天，要受到天罚。

柳宗元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批驳了韩愈的谬说。他明确指出，天地、元气、阴阳，都是普通的自然现象，都是物质的东西，“无异果蓏、痲痔、草木也”（《天说》）。这是对于儒家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的极大亵渎。柳宗元还认为，宇宙是无限的，自然界的变化是无穷的阴阳二气在宇宙间不断运动的结果，并不受任何意志力的支配，而是“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非国语·三川震》）。这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宇宙观，也是一个有力的抨击。

柳宗元痛斥了韩愈之流“天人相与”、“君权神授”的反动说教。他指出，用自然界的灾异现象，来解释人世的治乱祸福，是绝顶荒谬的欺人之谈；人事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与无意志的天毫不相干，万事万物都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天人“其事各行不相预”（《与刘禹锡天论书》）。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有神论的社会根源：“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非国语·神降于莘》）。在他看来，腐朽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及其代言人，逆历史潮流而动，都是些“力不足者”，因此，只好乞灵于天命鬼神，借以神化自己，欺骗人民群众；而中下层地主阶级的

革新派能够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则是“力足者”，所以“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时令论》）。柳宗元进而指出，国家的兴衰，王朝的更替，“受命不于天”，而是“受命于生人之意”（《贞符》），即不取决于天的意志，而取决于人心的归附与否。这种“生人之意”，虽然不是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说明社会的变化，但对于所谓国家治乱取决于天的胡诌，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否定，为革新派反对大地主阶级极端残酷的反动统治，进行政治革新活动，提供了哲学依据，仍然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中唐时期，中下层地主阶级革新派与大地主阶级保守派，都利用文学艺术为自己的政治路线服务。在这一方面，柳宗元是革新派出类拔萃的旗手。

柳宗元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可见，道即是他们革新派的政治路线。“文者以明道”，具体地讲，是“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要对进步的主张和事物加以支持和赞扬，对保守落后的思想和现象进行批判和讽刺。要言之，就是文学要为推行法家的革新路线服务。这和韩愈宗经复礼的“文以载道”是根本对立的。柳宗元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文坛上泛滥的那种“务采色，夸声音”（《答韦中立论师

道书》)的形式主义文学,指出这种文学是在华美文辞的掩盖下,贩卖儒家“诬怪”、“阔诞”的腐朽思想,“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害人非浅。对于反动儒生泥古不化、颂古非今的守旧倒退行径,他表示无比的愤慨。柳宗元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唐代古文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柳宗元在被贬以后,由于有较多机会接触社会和人民,进一步看到了大地主阶级弊政带来的恶果,从而更加坚定了主张革新的信念。他运用文学艺术这个武器,继续同保守派进行顽强的斗争,写出了大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作品。《捕蛇者说》、《田家》等诗文,比较真实地描绘了一幅幅农民终年辛苦,不得温饱,农村凋敝,十室九空的悲惨图景,揭露了以藩镇、宦官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同时,他又热情地歌颂了革新派的斗争,表达了他对革新事业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等作品,反映了作者对于保守派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心情,对于革新派战友的诚挚怀念和革新失败的无限痛心,表现了他在遭受打击迫害的恶劣环境下,仍然顽强不屈,坚持自己法家立场的斗争精神和政治情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的许多政治寓言,以犀利的笔锋,对保守派进行了辛辣的嘲笑和讽刺,富有深刻的哲理,至今仍能启发读者深思。他在《三戒》这组寓言故事中,形象而生动地揭示出反动势力虽然猖獗

一时，但终究要灭亡的道理。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曾引用《黔之驴》的故事说：“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毛主席赋予这个寓言以全新的政治内容，是“古为今用”的光辉范例。

柳宗元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时代的法家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他坚持了进步的历史观，用“势”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但不能也不可能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更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他勇敢地批判了孔孟之道，特别是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儒家的影响，甚至还沾染了佛教思想的污垢。尽管如此，柳宗元在中唐时期的儒家斗争中仍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愧为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

中唐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革新派同保守派在“二王、刘、柳”政治革新期间的斗争，以及革新失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论战，都是非常尖锐、复杂的。这场并

没有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儒法斗争，尚且如此，而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无法比拟的，它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不断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就必定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内，同被打倒了的的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进行长期的，曲折的，激烈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统一还是分裂，是中唐时期儒法斗争的焦点。柳宗元一生的政治活动和理论斗争，主要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的。历史的经验表明：凡是复辟倒退的反动派，总是大搞分裂，破坏统一；凡是主张革新，坚持进步的阶级和集团，都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中国自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统一时期约占三分之二，分裂时期约占三分之一，而且越往后分裂的时间越短暂，元、明、清三代的统一局面，连续了六百多年。这说明，国家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总趋势，是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叛徒、卖国贼林彪违背历史潮流，与广大人民为敌，大搞分裂，投敌叛国，终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今天，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的祖国空前统一和团结，社会主义事